

英国左翼学者眼中的世界变局

——以牛津、剑桥、肯特、坎特伯雷大学六教授为例

宋朝龙

(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871)

[摘要]新自由主义秩序放纵了金融资本的投机性、剥夺性积累,导致了西方社会中产阶级的衰落、主权债务危机、福利危机以及资本主义的体系性危机。在此背景下,民粹主义作为底层民众的愤怒发展起来了。但是,民粹主义是民众运动为极端右翼政治势力所左右的表现,是左翼政党对民众运动领导乏力的表现,民粹主义强化了社会分裂,其解决危机的方式也只会加剧危机。民粹主义的崛起及其破坏作用更显示了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复兴的现实迫切性。针对这些问题,英国左翼学者如何看待?为此,我们以牛津、剑桥、肯特、坎特伯雷大学的六位著名教授为例,分析一下英国左翼学者眼中的世界变局。

[关键词]英国;左翼学者;世界变局;21 世纪马克思主义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19.12.018

西方社会的体系性危机是由新自由主义秩序引起的。在此背景下,民粹主义发展起来了。民粹主义是民众运动为极端右翼政治势力所左右的表现,是左翼政党对民众运动领导乏力的表现,民粹主义强化了社会分裂,其解决危机的方式只会加剧危机。民粹主义的崛起及其破坏作用更显示了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复兴的现实迫切性。那么,针对这些问题,英国左翼学者如何看待?为此,我们以剑桥大学社会学系荣休教授大卫·莱恩(David Lane)^[1]、牛津大学布拉瓦尼克政府学院教授乔纳森·沃尔夫(Jonathan Wolff)^[2]、牛津大学圣艾德蒙学院教授戴维·普利斯兰(David Priestland)^[3]、前英国肯特大学政

治学教授、现任伦敦大学哥德史密斯学院政治学客座教授戴维·麦克莱伦(David McLellan)^[4]、坎特伯雷基督教会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系主任大卫·贝茨(David Bates)^[5]以及英国肯特大学荣休哲学教授肖恩·塞耶斯(Sean Sayers)^[6]等英国著名左翼学者的观点为例,来分析一下英国左翼学者眼中的世界变局。^[7]

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危机

新自由主义秩序放纵了金融资本的投机性、剥夺性积累机制,导致了中产阶级的危机、主权债务危机、福利社会的危机等,并最后顺次叠加为资本主义的体系性危机。那么,对这些问题,

英国左翼学者的看法是什么呢?

第一,新自由主义秩序放纵了金融资本的投机性、剥夺性积累。普利斯兰教授强调,放任的市场经济体制依赖于私人银行和私人投资机构。二战后初期,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国家对银行业和金融资本有着较好的管制,可以较好地调节经济发展。20世纪70年代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以来,全球金融体系、国际银行日益脱离国家的管制。这种系统的不稳定性为重大的危机埋下了隐患。沃尔夫教授说,新自由主义意味着更少的市场监管、减少福利、减少规则约束。西方国家社会问题的根源是富裕阶层的自私自利和国家对富人的偏袒。美国和西欧面临的问题之一是资本的转移。这样的情况已经持续很长时间了。富人为了避税,将资产移到国外,国家面临财政危机。如果政治家同时承诺减税和增加公共开支,那就只能靠贷款来实现,而贷款无疑会导致新的更大的麻烦。莱恩教授认为,全球化的显著特征是国家边界的缺失和淡化。欧盟内部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或许可视为全球化的理想状态,但全球化也导致国际资本不受单个国家管制,肆意追逐利益。在全球化背景下,国与国之间实际缺乏管控分歧、协调利益的民主程序,事实上处在无序状态。

第二,中产阶级的危机。普利斯兰教授指出西方国家的社会问题,如债务问题、社会收入不平等,其根源不在于全球化,而在于金融资本的积累机制。自由市场经济体系造成了严重的不平等,美国的普通工人目前负债累累。西方自由市场经济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如何控制金融资本。沃尔夫教授强调,除债务外,当前欧美社会还有许多更大的问题,比如,工业的崩溃,许多传统行业正在消失,这导致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例如,在美国,大城市陷入了严重的经济萧条,自杀、毒品和医疗问题十分严重。莱恩教授认为,工业衰落是资本追求更低生产成本造成的,全球化是产业转移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全球化的负面效应根源于资本的主导作用。在美

国,金融化和产业空心化导致中产阶级的没落,失业率飙升。

第三,主权债务危机。普利斯兰教授指出不同政府由于不同的原因而负债:美国的帝国主义模式一直依赖债务,它需要用债务来支持战争;英国政府负债的主要原因是金融危机,政府不得不通过债务拯救经济。麦克莱伦教授提到,英国政府声称要促进自由市场,但导致的结果是英国一半的公共事业由外国企业,特别是外国国有企业控制。比如,麦克莱伦教授自己家的用电,就由一家法国国有企业供应;英国正在兴建的一个核电项目,是法国国有企业和中国国有企业合办的;而另一家德国国有企业,在英国铁路市场中有相当大的份额。英国并不是没有成功的国有企业,但在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之下,这些国有企业进行了大规模的私有化,这也是导致国家贫穷、陷入债务深渊的原因之一。

第四,福利社会的危机。普利斯兰教授指出美国的普通工人目前负债累累,享有的社会保障也非常糟糕。沃尔夫教授指出,福利国家的再分配因财政枯竭而变得更加困难。在很大程度上,制度决定了初次分配是否公平。但是,初次分配的公平是很难实现的,大多数情况下要依靠再分配政策。因此,对富人征税势在必行。然而,遗产继承和国家对有产者的袒护却使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即使是传统高福利的北欧国家,再分配对社会公平的促进作用也有所下降。他指出,对福利体系无以为继的担忧,使得人们倾向于买房防老,通过房租来获取养老金,但这样就抬高了房屋的价格,让年轻人更难买房。在某种意义上,这些不平等还撕裂了社会。

第五,资本主义的体系性危机。这次西方资本主义危机的持续性传递,并没有使凯恩斯主义复兴,凯恩斯主义没有成为替代新自由主义的方案。凯恩斯主义的方案是使国家负债、增加公共开支来刺激需求。但是,这些危机是在国家已经严重负债情况下爆发的,国家已经无力承受更大的债务负担,因而凯恩斯主义也就难以复兴。麦

克莱伦教授认为,凯恩斯主义在政治上难以推行。就英国来说,倡导凯恩斯主义的工党,首先,其自身在脱欧问题上就存在分歧,其本身在运作和组织方面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另外,或许现在的脱欧问题吸引了政党和民众太多的关注,使得他们难以抽身去考虑严肃的经济问题。最后,因为凯恩斯主义涉及增税,而人民是讨厌提高税收的。普利斯兰教授指出,在20世纪90年代,尽管当时仍然存在各种分歧,但是人们仍普遍认为资本主义系统正在发挥作用,所以尚能达成普遍共识。但是,目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系统崩溃了,出现了两极分化的现象,人们在努力寻找建立新的共识。

二、民粹主义的崛起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民粹主义成为西方社会政治生活中令人瞩目的现象,成为各种社会问题的集中表现。民粹主义是底层民众的愤怒。英国左翼学者对上述这些问题,也有着基本的共识。

第一,民粹主义是底层民众的愤怒。莱恩教授认为,因新自由主义而陷入衰退的地区,如美国堪萨斯和新奥尔良地区的人民或许不会觉得新自由主义给他们带来了什么好处,因为他们失去了工作机会,生活和福利水平一落千丈。特朗普承诺为这些民众夺回工作,为此不惜使美国成为世界经济中的孤岛。在西欧发达国家和地区,以英国的苏格兰为例,曾经发达的工业如造船业,迁往成本更低的国家和地区。传统政党无法再作为人民的代言人,为他们争取利益。人民只能诉诸民粹主义以反抗资本主导的全球化,谋求体系性变革来改善自己的处境。塞耶斯教授认为,民粹主义是针对在过去二三十年中,新自由主义在西方社会所造成的问题的反弹。特朗普的支持者正是那些来自贫穷落后的农村地区的人们,以及来自煤矿关停、工厂倒闭的老工业区的人。麦克莱伦教授指出,资本为了维持自身的利润,越来越多地向贫困人口施加压力。因而,

贫困人口自然会产生一种对社会和统治阶级愤怒的情绪,通过投票反对现有的统治阶级精英。这样的情况在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是很普遍的:在英国他们通过投票脱欧来抗议,在德国和意大利他们则把票投给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贝茨认为,支持脱欧的经济民族主义者把脱欧视作一次激进的经济结构调整,这与近期特朗普扬言退出世界贸易组织、带头反对全球化的行为十分类似。普利斯兰教授指出:民粹主义之所以得到很多的支持,一方面,其中包含很多底层工人的声音,他们希望改善国家的经济状况、改善自身的生活条件;另一方面,民粹主义得到了民族主义者的支持,他们反对移民,希望削减移民数量。

第二,民粹主义运动的方向为极端右翼政治势力所左右。塞耶斯教授认为,民粹主义在本质上是右翼的。当今英国、欧洲大陆和美国的民粹主义属于明显的右翼运动,虽然以科尔宾为首的工党似乎代表一种左翼的民粹主义,但民粹主义事实上并非左翼,它表现出更多右翼的特征。民粹主义表面上寻找既非左翼又非右翼的中间道路,反对统治者和上层阶级,但这在实际上是否符合事实是值得商榷的。或许新左派和民粹主义对现有统治阶级都存在一定的批判,但那只是它们的部分相同之处。普利斯兰教授指出,目前的民粹主义几乎都是右翼的运动。右翼更加相信传统的秩序与等级。他们认为这是组织事物的正确方式。判断是否是右翼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赞同基于等级制度的市场,例如,富人就应该统治这个地方,凡事都应该根据市场。或者是否认为等级制度是其他方面的基础,例如,像民族主义那样,主张一个民族就应该优于另一个民族。目前,一些新自由主义者是世界主义的、反对种族主义的,他们喜欢移民,因为移民意味着廉价劳动力。而另外一些新自由主义者赞成民族主义,这主要是因为其经济地位发生了改变。麦克莱伦教授提出约翰逊领导下的英国政府是一个非常右翼的政府。它在积极促成脱欧,但是

很多民众和政客都对这个政府没有好感。美国的特朗普政府和英国的约翰逊政府对内倾向于新自由主义,高举自由市场的大旗,而对外他们却筑起高墙。民粹主义排斥移民,移民问题本来不是英国民粹主义最关注的问题,但是一些右翼却极力渲染移民问题,因为他们认为这个问题可以最大程度地煽动人民的情绪,从而赢取更多的选票。如果在过去50年中没有移民,英国将会是一个更加贫困的国家。移民问题牵扯到太多的东西,所以一般无法向普通民众解释清楚。莱恩教授对民粹主义进行了分类。其中一派,以西班牙民粹运动为例,“左”的色彩较浓:他们要求更有效的政府集权、调控市场和产业,以实现再工业化和保障就业。苏格兰国家党也持有类似观点。他们声称将在苏格兰独立后提供免费的教育和更优质的公共服务。另一派则带有更浓厚的右翼底色,诉诸传统的社会结构,如宗教和家庭。民粹运动可能带有某些社会主义性质的主张和诉求。在民粹主义如何看待移民的问题上,一方面,是老生常谈的说法——移民以接受更低薪酬为代价抢走了当地人的工作岗位;而另一方面,这也与国家的移民政策有关。例如,欧盟内部的人员和劳动力是自由流动的,但对外却有严格的移民政策;英国则宁可接受来自英联邦国家的移民,也不愿欧盟成员国的民众自由进出。移民政策反映了富裕国家民众对来自相对贫穷国家和地区的移民的长期警惕和排斥。沃尔夫教授认为,就英国的中产阶级而言,城市群体和农村群体有很大差异。城市中产阶级更像是左翼,而农村中产阶级则是右翼。左翼中产阶级是居住在伦敦、曼彻斯特和大学城的人;右翼中产阶级通常住在农村。英国留在欧盟的开支被误导性的宣传有意识地夸大了,目的是煽动民众。沃尔夫教授曾写作《当今为什么还要研读马克思》一书。他提到,在写作那本书时,西方国家政府似乎还代表全体人民执政;而在今天,这些政府为富人办事是明摆着的事情。正如当前我们所见的,特朗普正在想方设法削减富人应当缴

纳的税赋;他为穷人发声,实际却无所作为。民粹主义向选民作出承诺,投其所好以换得选票。民粹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两者不是一个概念,但它们可能会合流。特朗普政府就是一个例子。英国约翰逊首相本人目前还没有经过大选的检验,这次的选举只是一个保守党内部的选择,而保守党在英国并不占多数。但约翰逊推出一项政策,要建立更多的监狱来解决移民带来的犯罪率问题。然而,并没有证据证明移民的犯罪率更高;约翰逊有可能只是想在选民当中制造一种恐慌。因此,约翰逊大概率也是一位民粹主义政治家。贝茨教授指出,尽管目前新自由主义出现了危机,但这并不意味着英国政府和西方民众会抛弃它。政府仍然在践行新自由主义的政策;相当一部分民众,特别是农村居民,对新自由主义还抱有信任。

第三,民粹主义是左翼政党对民众运动领导乏力的表现。左翼发生了分化,一部分人去支持民粹主义。沃尔夫教授认为,在过去,左翼运动多指马克思主义的工人运动。自20世纪50、60年代的社会运动以来,左翼日渐成为中产阶级的代名词;但近年来,原本的左翼逐渐投入右翼的怀抱,反对移民、反对平等,政治倾向发生了改变。麦克莱伦教授指出,现在英国的意识形态处在一个不稳定的和变化流动的阶段。过去,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英国的政治是很简单的,两大政党分为左派和右派。但是最近,由于英国脱欧,这种简单划分在很大程度上被瓦解了。政党内部对于脱欧产生了较大的分歧,在支持脱欧和反对脱欧之间形成了断层,从而打破了以往较为稳定的政党结构和意识形态样态,例如,英国工党自身在脱欧问题上就是分裂的。塞耶斯教授认为,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经验来看,社会主义显然有着更好的能从根本上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案。在20世纪30年代,西方的各个国家都掀起了很强的共产主义运动浪潮,当时,以苏联为中心,各国都有比较强的共产党,但结果社会主义运动仍然是被法西斯主义摧毁。当今的共

产主义和其他左翼运动力量比当时更为弱小,所以民粹主义受到的挑战比在 20 世纪 30 年代要小得多。法兰克福学派,如弗洛姆的《逃避自由》一书或许提供了部分解释。现实中确实仍存在着工人阶级,但在政治上如何把他们组织和动员在一起是一个大问题。二战后欧洲和美国左派力量的强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西方政府因战争不得不动员工人阶级。工人地位短暂的改善是战争时期政府和工人阶级所做的一种交易。但此后新自由主义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工人运动和工会组织。因此,工人们需要重新组织起来并确认自己的力量。早期在大工业的情况下形成的是工业工人阶级,每个工人都有相似的经历,这使得工会更容易组织。现代工人阶级主要是产业工人阶级。同时,自动化技术的推广使得和过去相比,在大型工厂中工作的工人数量变得更少了。更雪上加霜的是,在后工业化时代,工人相对来说更分散,而且工作形式日趋多样化,如白领工作者或自由职业者的纷纷出现。最后,特别是随着电子计算机等信息技术的普及,人们可以在家里工作,因此,他们的工作时间更灵活、组织更分散、共同经历也更少。另外,工人本身无国界,然而,实际上金融资本也是无国界的。虽然世界联系得越来越紧密,从理论上说工人的共同利益应该是可以使他们联系在一起的,但伴随着资本家阶级的全球流动,工人却缺乏能使他们在国际上联系起来的机制。这一切都使工人自身组织起来变得更加困难。普利斯兰教授认为社会主义是关于平等的,而平等是需要摆脱等级层次结构的,这个层次结构可能是经济上的,也可能是种族上的,例如,为什么西方白人比其他种族更优越,拥有更多的权力,也可能是性别上的,例如,男性为什么比女性拥有更多资源。社会主义之前与文化左派不能相容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经济是一切的根本,文化、性别、种族上的问题不是优先考虑的事项,而目前新一代的年轻人在性别平等、种族平等方面比上一代更具文化自由度。因此,传

统的左右翼更关心是否支持经济中更多的市场因素,而目前西方社会民粹主义最主要的关注点与其说是经济问题,不如说是身份问题。在 1968 年前后,新左派试图将西方文化左派和经济左派联合起来,但 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经济左派和文化左派的分裂加大。20 世纪 90 年代起,英国左派整体上变得更加强调文化上的自由平等,也更关心环境问题。现在的英国左派仍旧试图将经济与文化两者结合起来,正如目前工党领袖科尔宾所做的那样,但是这十分困难。因为很多经济左派人士并不关心环境,并不喜欢移民,并不喜欢性别平等。莱恩教授认为,群众运动的发展取决于诸多因素。当今欧洲民粹主义方兴未艾,但共产党和社会党的影响力却微乎其微,所获选票几乎在选举人口的 3% ~ 5% 的水平上徘徊。

第四,民粹主义强化了社会分裂。普利斯兰教授认为,美国的特朗普现象与英国的脱欧问题正在不断撕裂人们的共识,拉大左右翼人群的分歧。如果现在英国再次举行全民公投,那么将有 55% 左右的人反对脱欧,因为很多人在三年前的脱欧公投时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与复杂性。麦克莱伦教授认为,新自由主义是社会经济的意识形态,用于领导市场、服务于金融资本的发展,而民粹主义其实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因为它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连贯的体系,它是作为对金融资本所导致的社会后果的抗议而出现的。沃尔夫教授对脱欧导致的意见分歧作了强调。在应对脱欧方面,英国人本应团结一致,而现在还很难看到英国人在未来能取得什么进展。现在的讨论只是停留在互相攻击的层面,这是非常糟糕的。塞耶斯教授表达了对脱欧可能使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恶化的忧虑。他认为,英国工人实际上属于英国加入欧盟以来的获益者,因为欧洲的劳动立法往往比英国的劳动立法更有利于工人。这是他支持英国留在欧盟的一个重要原因。欧盟有很多关于健康安全、限制工时和工人权益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这实际上在很

多方面都有助于英国工人改善自身处境。脱欧对英国劳动者来说是危险的,因为这意味着资本试图通过放松管制来提高竞争力,对英国工人改善工作条件非常有害。劳工立法非常重要,而欧盟在这方面走在了英国的前面。

第五,民粹主义解决危机的方式会加剧危机。普利斯兰教授认为脱欧对英国的大学教育会产生非常糟糕的影响。英国目前其实非常依赖移民,英国的经济也受益于欧洲大陆,如英国的贸易、银行、计算机等行业都依赖于欧洲大陆,而这些行业正是英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英国在脱欧之后,整个经济将长期遭受损失,将会处于一个漫长的下滑期。英国经济下滑的严重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脱欧协议。特雷莎·梅所提出的脱欧协议是很糟糕的,因为这个协议并没有很好地解决银行业、服务业、教育业等问题,但是无协议脱欧无疑是最为致命的。麦克莱伦教授担忧民粹主义的不断壮大,可能把英国引向半法西斯主义和种族主义的社会。民粹主义不是应对现在社会问题的正确答案,因此,应该与其进行斗争。现在的脱欧问题消耗了政党和民众太多的精力,使得他们难以抽出身来,更不用说考虑严肃的经济问题。贝茨教授也提到,就英国国内的政治分野而言,右翼的经济民族主义者有所抬头,希望趁乱攫取更多的权力和好处。这些经济民族主义者把脱欧视作一次激进的经济结构调整。坎特伯雷当地的大学中,一部分员工其实是欧盟公民,他们可能不得不在英国正式脱欧后被要求离开英国,但他们出生在英国孩子却是英国人。曾有人预言脱欧的第二天,英国经济就会崩溃。尽管这并没有发生,但是英国目前处于一种近乎假死的状态。政客们不知道如何处理脱欧问题,这让人十分担心却又于事无补。对各种形式的经济民族主义的思考,离不开全球化这个框架。人们找不到工作,引发了对体制的信仰危机,人们不觉得自己投票还有什么用,一种认为政治精英与民众脱节的想法开始传播。这种情况下,大规模经济结构调整事实

上希望渺茫。目前,英国国内在脱欧协议这个问题上意见纷纭,约翰逊的首相之位甚至很有可能因此而失去。沃尔夫教授直截了当地说,英国脱欧是一场灾难。首先,这里有一个基本事实:当英国参与欧盟时,作为回报,英国能得到巨大的利益。当英国离开时,这将变成一个严峻的问题。英国的低端服务业其实非常仰仗移民以提供劳动力。人们排斥的不是来自欧洲的移民,而是来自中东等战乱地区的移民,但脱欧对此可能无济于事。

三、对社会主义历史实践的评价

英国左翼学者对苏联模式、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马克思主义对21世纪的意义看法,也值得我们借鉴。

第一,对苏联模式的反思与评价。沃尔夫教授认为,在苏联模式下,党员利益被优先考虑,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避免公权私用。普利斯兰教授指出,在20世纪20年代,苏联拥有着更加市场化的经济系统,这个系统是计划和市场相混合的,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模式相近。这种相对自由、允许简单交换的模式,对于农民以及手工业者来说是很好的。但是,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的经济危机,使商品价格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自由经济体系处于危机之中。因此,苏联最初的“市场体系”很难维持和发展下去,从而采取了指令性更强的计划经济体制。斯大林从农村获取了大量资源,将其投入到重工业发展中,造成苏联除了重工业以外的其他产业发展严重滞后。在经济上,斯大林模式作为一个广泛的指令性经济系统,重视发展重工业,用以建造战争机器,却忽视了对人们的生活改善,因此带来了很多负面的影响。苏联模式的产生也与当时较多的国际冲突有关。在苏联建立之初,面临着德国等非常激进的“邻居”和敌人。斯大林模式非常有效地将整个国家组织起来,在一定时期具有很大的意义。但是,要重视斯大林模式存在的问题。在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控制

一切,真正的市场并不存在。如何创造或者引入市场机制成为实际的难题。当苏联试图改变发展模式时,既得利益者为了继续拥有资源,会拒绝为消费者生产消费品。在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之后,东欧国家尤其是俄罗斯的经济出现了严重的崩溃。人们仍然记得20世纪90年代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时期。前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们,在某种程度上看到了自由市场经济在极端混乱下的场景。他们可能会更加怀念苏联时期,尽管当时的生活难以说是丰富多彩的,但至少是稳定的。塞耶斯教授指出,产生于20世纪50、60年代的英国新左派,背景是对斯大林式共产主义道路的批判,带有强烈的左翼特征,目标是重振左翼力量,复兴马克思主义并使之对当时的政治更有意义。莱恩教授则以苏联为例,说明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要处理好“按需分配”这个问题。他认为,除了满足人民的基本需要,人民在享受方面的需要也应纳入考虑。苏联时期,人民享有免费医疗和充分的就业,基本需求得到了保障,但是计划经济体制未能满足苏联人民享受的需要,例如热带水果的供应就存在短缺,不能实现人民相应的预期。这或许影响了人们对苏联的态度和评价。资本主义为了资本增殖的需要,会创造虚假的需求,以诱导消费,但是,除物质层面外,人还有精神层面的追求,例如追求和谐的人际关系和交往关系,而这些都是货币买不来的。苏联模式下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典型代表,其特征是政府主导的产品分配。

第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开创了一条现代化的新道路。普利斯兰教授认为,发展中国家很难在没有强大国家体制的情况下使用市场经济体制,同时,完全的市场经济体制也会导致效率低下。因此,人们常常想把市场与国家结合起来。20世纪70年代,美国不断鼓励中国进行国际贸易,以此作为对抗苏联的一部分。当时中国的目标是发展经济,选择以某种方式向全球市场开放是完全合理可行的。中国在经济方面

表现突出,在帮助人们摆脱贫困方面贡献巨大。改革开放成功地将国家机器与市场经济融合起来,例如中国保留着大量的国有企业,同时发展了混合所有制经济、私营经济以及各种乡镇企业。中国关于改革开放的决定是理性的。改革开放通过实行混合所有制经济、将经济发展与政治进步相联系等方式,成功地鼓励行政官员支持经济改革,因而改革开放取得了极大成功。而戈尔巴乔夫在试图改革经济时,激进地摧毁了原来体系下的权力制度,改革最终走向失败。中国推动的改革开放,在20世纪80年代,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相近。在20世纪90年代,这一发展模式更加关注外国投资、发展大型公司、减少国有企业,逐渐发展出更具特色的中国道路。中国的模式是国家组织与经济发展激励机制相结合的混合体。从逐步改革的角度来看,这是非常积极的。普利斯兰教授也不否认中国模式存在的问题,如腐败和环境污染。普利斯兰教授还表示,目前学界对于中国模式该如何发展存在争论,部分学者认为中国模式需要更加自由,而新左派学者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在自由主义方面走得太远,例如以汪晖为代表的学者。但无论如何,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国家组织已经紧密联系在一起了。普利斯兰教授认为,社会主义和儒家思想之间存在相似性,例如,两者都存在社会团结的因素。但是,不能忽视二者的根本性区别。儒家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是与现代性相抵触的,但现代性却是社会主义的重要方面。如传统的儒家思想相信等级制度,尤其是社会家庭等级制度,而马克思主义反对等级制度。麦克莱伦教授说自己接触和观察过中国的很多行业,例如银行业是由中国政府控制,而不是被私人所掌握。虽然一些特定的消费品的领域完全由市场决定,但是中国的市场监管也起着很重要的作用。贝茨教授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在中国流行的程度感到惊讶。新古典主义并不是像很多人以为的那样,只是关于鼓励消费购物和提倡经济自由化的学说。塞耶斯教授回顾了1974年第一次造访中

国时的经历,指出中国从一个典型的自给自足的农业国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中国的工业生产已和世界市场高度关联。中国积极参与了全球化进程,如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在此基础上,塞耶斯还强调,并非只有中国从全球化过程中受益,西方国家也从中国获得了物美价廉的商品。

第三,马克思主义对 21 世纪的意义。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为解决当代现实问题提出方案。麦克莱伦教授肯定马克思主义的当代生命力,认为西方正在出现对马克思主义有利的改变,越来越多的人对马克思主义感兴趣。在苏联解体的时候很多人以为新自由主义胜利了。2008 年的金融危机后,马克思主义有复兴的趋势:很多困扰西方人的问题其实都可以在马克思那里找到一定的答案。民粹主义并不是针对金融资本或新自由主义所带来的问题的正确解决方案。随着资本主义变得越来越不理性和混乱,马克思的观点将呈现出价值。人们对马克思的态度越来越严肃,与三十年前相比,目前关于马克思的研究著作是更为有见地和智慧的。在马克思看来,思想是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而不断发展的,所有的政治思想都是社会和经济环境的产物,没有适用于一切社会的政治学说。马克思在著作中有着出色的政治分析,如《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麦克莱伦教授还强调,鉴于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形势,有必要重新审视“发展”的概念。“发展”伴随着生产力的膨胀,而资本主义没有这种“发展”就不能延续。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可持续性,决定了其最终失败的命运。也正因此,共产主义社会必须是一个环境友好型社会。莱恩教授认为,当代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关键,是避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具体论断作教条式的理解,一切理论都应当随时代而发展。普利斯兰教授指出,马克思主义非常强调资本的概念,认为资本是导致剥削和不平等的根源。在 2008 年经济危机之后,西方政府采取的量化宽松等政策,以及其他应对方

式,并没有解决阶级之间的不平等,反而扩大了金融危机之后的社会贫富差距。因此,不平等现象驱使西方的知识分子重新思考经济问题,寻找解决经济问题的方法。贝茨教授则提到,他观察到自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马克思对资本的阐释引起了越来越多人的兴趣和关注。对他个人而言,传统西方经济学的局限性暴露了出来。沃尔夫教授认为马克思有意不告诉我们未来社会的图景,马克思说自己不描绘未来愿景的乌托邦,而将自己视作一位关注历史变迁的科学家。莱恩教授强调有无市场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根本区别在于生产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真正需要还是为了实现利润。社会主义应以人民为中心组织生产,满足人民的教育和医疗等基本需要。社会主义并不一定是非市场的和排斥私有产权的。塞耶斯教授认为,全球化实际上是“双赢”。当然,这个过程不会是一帆风顺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狭隘的民族主义可能成为人类走向联合的最大障碍。尽管如此,全球化趋势在根本上仍是不可逆转的。当前的所谓逆全球化,在更长远的意义上而言,是一种经济上的特定现象。

四、小 结

自 2008 年美国金融危机以来,西方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谓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特朗普总统领导下的美国政府退出一系列国际组织,约翰逊政府促使英国脱离欧盟,曾经积极推动全球化的两个新自由主义国家带头掀起了逆全球化潮流,全球政治气候为之一变。那么,逆全球化浪潮愈演愈烈的原因何在呢?原因就在于:新自由主义秩序放纵了金融资本的投机性、剥夺性、寄生性积累。西方社会,从形式上来看是自由社会,而实质上却是金融资本全面支配的社会。金融资本除通过生产、流通和信用的革命来积累以外,还借助自身的垄断地位,通过定价权、金融投机、地产寻租、支配国债、控制货币发行权、制造和利用危机、操纵国家公共政策等各种

手段来从事投机性、寄生性和剥夺性的积累,这导致了西方社会制造业的空心化、中产阶级的衰落、主权债务剧增、福利政策难以为继、资本主义陷入体系性危机的困境。在此背景下,民众被鼓动起来了,他们走上街头或者利用选票表达自己的愤怒。但是,相当一部分民众并没能把造成自身困境的原因归结于金融资本的统治,而是归罪于为其他族群或国家。民众不自觉的被极端右翼民族主义势力加以利用;民众运动和右翼民族主义势力相结合,产生了当下西方强劲的民粹主义潮流。民粹主义被极端右翼政治势力所左右,是左翼政党对民众运动领导乏力的表现,民粹主义强化了社会分裂,其解决危机的方式也只会加剧危机。民粹主义的崛起及其破坏作用更显示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复兴的现实迫切性,在这样的时代,应该去反思和总结苏联模式的经验,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本质属性和特点,发掘马克思主义对21世纪全球发展的意义。上述这些基本的观点,贯穿在英国左翼学者的思想意识之中,折射出英国学者对全球大变局的认知。

注释:

[1] 大卫·莱恩,剑桥大学伊曼纽尔学院名誉研究员、剑桥大学社会学系荣休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国家社会主义、后共产主义社会的转型、苏联和东欧的政治、全球化和公民社会等。曾多次在苏联、中国、东欧、中欧和日本的大学及研究机构进行学术访问。2018年5月初,莱恩参加了第二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莱恩的代表性学术著作包括:《国家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转型》(*The Capitalist Transformation of State Socialism*)、《后苏联空间的精英和身份》(*Elites and Identities in Post-Soviet Space*)、《反思“颜色革命”》(*Rethinking the “Coloured Revolu-*

tions)”。代表性的学术论文有:“Social class as a factor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state socialism”“From state socialism to capitalism: The role of class and the world system”和“Revolution class and globalization in the transition from state socialism”等。

[2] 乔纳森·沃尔夫,牛津大学布拉瓦尼克政府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社会正义、贫困和公共安全等。著有*Ethics and Public Policy: A Philosophical Inquiry* (Routledge, 2011), *The Human Right to Health* (Norton, 2012)、*An Introduction to Moral Philosophy* (Norton, 2018), 代表作为《当今为什么还要研读马克思》。

[3] 戴维·普利斯兰教授,牛津大学现代史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共产主义史、社会主义史、苏联史等,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等。代表性著作有《红旗:共产主义史》《商人、军人、文人:新权力史》等。普利斯兰教授的《红旗——共产主义与现代世界的形成》一书,将比较方法与广泛的叙事结构相结合,入围朗文2010年最佳历史书奖。

[4] 戴维·麦克莱伦,英语世界公认的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英国肯特大学政治学教授,伦敦大学哥德史密斯学院(Goldsmith College)政治学客座教授。主要著作有:《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1969)、《马克思主义以前的马克思》(1970)、《马克思思想导论》(1971)、《马克思传》(1972)、《马克思的思想与生平》(1973)、《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1979)。

[5] 大卫·贝茨,坎特伯雷基督教会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系主任。研究领域为当代激进政治思想、马克思主义、社会运动等。代表作有《理论与实践中的“占有”》《“制造政治事件”——“知识交换”下的政治教育》。

[6] 肖恩·塞耶斯,英国肯特大学哲学荣休教授。为《激进哲学》和《马克思与哲学社会》的创始人之一,《马克思与哲学评论》的创始人兼主编。研究领域涉及社会哲学、伦理学、知识理论、形而上学和逻辑学等。代表性著作有《马克思与异化》《马克思主义与人性》《黑格尔、马克思与辩证法》等。

[7] 2019年8月11-20日,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宋朝龙副院长一行九人,访问了六位英国学者,本文所用资料都是来自与这些教授进行交流和对话的第一手资料。本次学术访问团成员还包括姚苏薇、汪越、李文宇,张蓝天、马迪亚、庄若璇、汪亚宁、李建伟等。

[责任编辑:刘 鏊]